

从“暴虐”到“人味”的秦始皇
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影视剧中的秦帝国几乎与“暴政”二字画上了等号。

这种印象并非凭空而来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，中国知识界对皇权总体上持否定态度，秦始皇作为“焚书坑儒”和“苛政猛于虎”的代表，自然成为批判的靶心。这种历史观投射到影视创作中，便形成了“暴君秦始皇”的影像定式。

关于秦始皇，著名历史学家林剑鸣认为：“一个人生前只活了五十岁，但死后却被人评说了两千余年。此人就是秦始皇。”学界对秦始皇的讨论也曾在20世纪掀起过热潮，对他的功过是非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。但正是因为其形象的复杂性，才给了诸多影视作品更大的发挥空间，留待世人评价。

早期的影视作品里，秦始皇的残暴、秦法的严苛、秦政的短命，构成了当年观众对秦帝国的认识。转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。一批影视人开始尝试打破其脸谱化书写，试图为这位千古一帝编织更复杂的人性维度。有姜文主演的电影《秦颂》，陈凯歌导演的《荆轲刺秦王》，张艺谋导演的《英雄》，甚至有由

黄易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寻秦记》。

1996年，电影《秦颂》做出了新的尝试，让每一个人物都极具复杂性。姜文饰演秦始皇，葛优饰演高渐离。影片以秦始皇与高渐离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核心，探讨权力与艺术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。姜文塑造的秦始皇“形象复杂多面，他既有作为帝王的霸气与雄心，也表现出对友谊和个人感情的挣扎”。

1998年，陈凯歌的《荆轲刺秦王》上映。李雪健在片中饰演了一个“疯疯癫癫”的秦始皇。李雪健曾谈到他对秦人特点的理解：“秦人的特点是‘拙’，从兵马俑、汉像砖、先秦青铜器和字画里，我都可以找到例证。因此，我的表演风格不能太随意，也不能太雕琢。一句话，那时候的人，心眼儿实，为实现理想，一根筋。”

这种“拙”与“疯”的结合，恰恰让秦始皇从神坛走下来，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影片中秦始皇在被刺杀时发出灵魂拷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知道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，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，都成了一个国家。”这句话将秦始皇的野心提升到了历史哲学的层面。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征服，而是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秩序。

这两部电影的共同之处在于：它们不再满足于呈现一个“暴君”或“明君”的单一维度，而是试图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，想象一个真实的人如何在权力与理想的撕扯中成为“秦始皇”。正如有评论者所说，陈凯歌在《荆轲刺秦王》中“实现了为历史人物‘去脸谱化’的意图”。

2002年，张艺谋的《英雄》以2.5亿元票房横扫市场，开辟了华语商业大片的新纪元。《英雄》中刻画的秦始皇愈发偏向正义，在同刺客无名的一番对话后，秦王褪去乖戾之气，流露无奈，终止战乱，修建长城，护国护民。对此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，《英雄》对嬴政的精神人格进行了重新编码和附会。

对于秦始皇“四海一，六合毕”的伟业功绩，确应给予历史的定评。其后，车同轨、书同文的举措，也为我国历史文化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。然而，由于强征暴敛、钳制民声、冷酷专制，大一统后的秦帝国，二世而亡。

很多围绕《英雄》的争议，恰恰说明了这部电影的关注度。

《英雄》无意还原历史，它要做的是用色彩、构图和诗意去创造一个关于“天下”的寓言。正如有评论者所说，如果把《英雄》当成一个传奇故事来看，它自圆其说，并无不妥。